

第一章

近代的九江县社会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九江县

一、历史悠久 地位独特

九江县属江湖平原与低山丘陵相混交连的地区。庐山向南延伸至境内的大步尖峰,海拔 664 米,居全县最高点;南屏“面阳”、“马头”、“桃花尖”诸山,总称柴桑山;西南岷山、中部株岭、西北长山三大山系,皆出自幕阜山余脉,分别向东和东北蜿蜒;中部残丘岗地,灰岩裸露,地下深藏多处奇特溶洞;北和东北系江湖冲积平原,其中位于长江中心的新洲三角洲乃全县海拔最低处。水系以长江为主体,过境 54 公里;境内水面在 5 万亩以上的湖泊,有赛城湖、赤湖、八里湖;流域面积在 1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 21 条,全长 303.6 公里,以岷山、黄老门分水岭为界南北分流,南流经德安博阳河汇入鄱阳湖,北流聚赛城湖、八里湖后汇入长江。

九江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晚期,便有先民聚居在这片土地上。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开始建县,名曰柴桑。后历称寻阳、汝南、湓城、浔阳、德化等,1914 年(中

民国三年)改为今名。1927年3月,县城另设九江市政厅,次年改称市政府,1930年撤销。1934年6月重设九江市政委员会,1936年又并入九江县。1949年九江解放,于城区设九江市,市县分治。1959年1月撤县并市,市县合署办公。1961年9月市县分开,恢复九江县建制。1968年县治迁于沙河街。1983年7月,撤地并市,实行市管县制,九江县隶属九江市。

九江县自东晋政权南移,北民大批南迁,开发日盛。唐有“江南鱼仓”之誉,宋冠“鱼苗之乡”盛名。近代亦曾崛起为全国的“三大茶市”、“四大米市”,几经繁荣。九江县钟灵毓秀,孕育出伟大诗人陶渊明。山水奇特,引无数英豪为之倾倒。在我国历史上,凡有成就的大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考察巨擘,几乎大多在此留下足迹和墨宝,连戎马倥偬的抗金名将岳飞亦选此地为“第二故乡”。

九江县地位独特,历为江西的“首府首县”,亦有“江西门户”之称。它雄踞宁(南京)汉(武汉)之要冲,扼赣鄂皖之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曾在此发生过许多重大政治角逐和兵争事件。诸如周瑜柴桑誓师战赤壁、陶侃与温峤在寻阳联兵平苏峻、南宋岳飞进军江州追击李成、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太平军与九江城共存亡等等,至今仍为人所熟知。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九江县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是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上演了一出出可歌可泣的英雄活剧,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二、九江县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列强的侵入,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九江县也同全国一样,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等国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而结束战争。在《天津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同意将汉口、九江、南京等地开辟为通商口岸。1861年3月,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巴夏礼、海军中将河泊和派驻九江的领事许士等人到达九江,与江西省负责全权筹办九江通商事务的布政使张集馨签订了《九江租地约》,划定当时县城内的九江招商局(今浔阳区港口公寓址)以西、沿长江至龙开河的滨江地带面积约150亩土地为英国租界。英国人确定了租地范围后,1862年强行拆除居民房屋,填塞贯通甘棠湖与长江的湓浦港,大兴土木,建起一幢幢西式楼房,正式设立租界。此后,美国、法国、德国、俄国、丹麦、日本、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也根据“一体均沾”原则,先后在九江或设领事馆,或设教会、学校,或开办商行、公司、工厂等。从此,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赣北门户——九江县,就被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了。

外国列强侵入九江后,通过设立租界和实行领事裁判权,在政治上破坏了中国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九江英租界建立后,英国人在租界内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统治制度:他们设立工部局,行使租界内的立法权与行政权;设立巡捕房,建立警察队伍,负责

维护租界内的秩序；设立法庭，制定各种法规，对违反法律的本国公民进行处理；设立税收机关，在租界内征税和罚款。这样，九江英租界成为独立于中国法律之外的特殊区域。

美、法、德、俄、丹麦等国虽在九江没有设立租界，却由驻上海、南京、汉口等地领事兼任，荷兰、日本等国先后在九江设立了领事或副领事。同时，按照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所有在九江经商、传教的外国人均受领事裁判权保护，享有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和法律制裁的特权。他们在九江触犯法律，应交该国驻中国的领事处理，中国政府既无权关押，也无权依法制裁。不仅如此，连那些入了“洋教”而借教会势力为非作歹、触犯法律的九江教民也可得到外国传教士的庇护，迫使九江当局从轻处治，享有与九江民众不同的特权。

外国列强还利用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控制着九江县的经济命脉。他们通过攫取中国的内河航行权，垄断了九江的长江航运事业。英国先后在九江设立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祥泰洋行，日本在九江设立日清汽船株式会社，而中国自己在九江仅仅只有一家招商局，九江县的长江航运事业主要为外国的轮船所控制。英国在九江开办邮政局，控制九江的邮政事业。日本通过其东亚兴业会和台湾银行借款，修建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控制了这条铁路，并迫使铁路管理局以低价出卖了该路在九江琵琶亭的江岸码头。至于设在九江的海关，从设立初期即为外国人管理。英、美、法、俄、德、日本、葡萄牙、比利时等国先后担任九江海关税务司要职、攫取了九江海关的行政权和关税的支

配权。

各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大量的商品倾销,挤垮处于弱势地位的九江县民族工业、传统手工业和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伞(布伞)、洋纱、洋布、洋铁、洋钉、洋针、洋线、洋袜子等几乎包括了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物品的“洋货”纷纷涌入。外国列强还通过出口贸易,掠夺了九江县大量低价的农副产品。总之,外国列强通过对九江县经济的掠夺,促使自然经济解体,使刚刚兴起的处于十分孱弱地位的九江县现代工业和传统手工业濒临破产。

帝国主义列强还打着“文化宣传”和“宗教信仰”的伪善旗号,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他们在县城设教堂,办学校,建医院,进行奴化教育,从精神上麻醉九江县人民,使之成为帝国主义任意宰割的驯服工具。1865年,法国首先建立县城外的天主堂,并以此为中心进行扩张,又在县城内建立了天主堂、仁慈堂、天主堂医院和济世中、小学。1867年,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随之侵入九江县,建立赣北教区,管辖九江的甘南堂、化善堂、思益牧区、妇女传道部以及同文中、小学,儒励中、小学,翹德、翹才、翹志、翹秀小学,生命活水医院,但福德医院和护士学校等。1905年,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也在九江建立教堂和学校。接着,美国教会系统的安息日会、通宣会,英国教会系统的伦敦会、长老会、浸礼会、内地会等也先后在九江县城设立了教会组织。

帝国主义列强在九江开埠通商设立租界后,还以军事力量作后盾,恫吓和威胁九江人民,以维护他们在九江的“权益”。如英国在九江港岸专设长江舰队,除日夜在江中

巡逻外,还在官牌夹、二套口、江北窑厂三处各泊一艘军舰,专门对付九江人民,以保护其租界利益。一时间,在江中的军舰上、在租界的屋顶上,竖满了英国国旗、美国国旗、法国国旗和日本国旗。腐朽没落的清朝政府和封建军阀,屈服于帝国主义,使列强的侵略势力日益嚣张起来,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军事上都成了九江县人民的统治主宰,九江县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三、九江县人民陷入苦难深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九江县人民苦难深重。政治上深受压迫:广大人民被剥夺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民主权利。全县各区、乡政权完全掌握在豪绅手中。他们各霸一方,劳动人民只能受其统治,毫无权利可言。他们还建立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遍及各地。不仅社会最底层的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要受到严厉制裁,知识分子和社会中上层人士对现实稍有不满意,也随时会被扣上“乱党”、“国贼”等罪名并受到迫害。经济上遭受压榨:外国列强历次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总是以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而结束。历次战争的赔款,大大加重了底层人民的经济负担,榨尽了民脂民膏。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九江县人民过着受蹂躏、受摧残、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挣扎在死亡线上。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斗争很快遭到失败。辛亥革命失败后,英、美、法、意、日等国为了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一方面继续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掠取中国的大量白银,另一方面又大量倾销其工业化大机器生产的“洋货”,严重地冲击中国市场,促使基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体系逐渐解体。同时,他们还操纵各派军阀挑起内战,使中国人民重新陷入军阀混战的灾难深渊。当时霸踞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其他派系的军阀,在长江中下游各省争夺地盘,互相倾轧,连年混战。九江县因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成为军阀争夺的重点。孙传芳在九江驻扎重兵,致使九江人民的处境更加悲惨:一是军阀苛索粮饷,加重了农民负担;二是地主豪绅以军阀为靠山,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地主豪绅勾结军阀各霸一方,发展反动武装,私设公堂牢狱,霸占良田山林,以及开烟馆,设赌场,包揽诉讼,荒淫糜烂,无恶不作;三是封建地主乘兵荒马乱和自然灾害频繁之机,大肆掠夺土地,导致农民大量破产,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集中到地主恶霸手中,农村阶级分化加剧,广大农民更加贫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县地主人口不到10%,却拥有80%以上的耕地、山林和大批生产资料,而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耕地不到20%。广大农民群众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生活无比凄惨。

贫苦农民为了求得稀粥糠菜充饥,不得不忍受重租的剥削。当时租种地主一亩田,一年要交二至三担谷租,不管水灾旱灾,有收无收,一律不能少,这叫“死租”。还有一种叫作“活租”,即租种田地的收入,一般是对半分。这是最轻

的。最重的是“倒三七”，即农民每收一百斤谷子，自己只能得30斤，要交70斤给地主。除了交租之外，地主对农民还有各种各样的额外榨取，如小秤称出，大秤称进，佃户逢年过节要送礼，收割前要请酒，这都是常事。租种地主的田，还要无代价地给地主服役，种田砍柴，随叫随到。遭到天灾歉收，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打上来的全部粮食都不够交租，只能饿着肚子负重债。

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下，地租、债务、苛捐杂税紧紧勒着贫苦农民的脖子，使九江县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农业生产停滞，手工业者失业，加上“洋货”充斥市场，贫困、饥饿、疾病、死亡笼罩着整个九江县大地。而地主豪绅们则过着田连阡陌，谷满粮仓，拥妻抱妾的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地主豪绅还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更是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每遇青黄不接或者天灾人祸的时候，农民们只得向地主、富农借高利贷。高利贷的种类很多，有年利、月利。一般是加三、加五，最重的甚至加十（翻倍）。地主放债方式：一是“放谷”——青黄不接时借地主一担谷，秋收时要还两担；二是“借谷还油”——春荒时借地主两担谷，春收时要还一担油；三是“放新谷”——这是地主最恶毒的剥削手段，比如四、五月份每担谷价值六元，而在八月份每担谷只值二元，地主在春荒时把谷卖钱，再以八月份的谷价钱贷给农民，并且先扣利息，借一元五角，秋收时就要还一担谷。这样，地主的一担谷，就要剥削农民五担谷。不仅如此，农民借贷，还要找富人“担保”，到期不还，即本上生息，利上滚利，时间久了，就只好卖田卖地，或以房屋抵债，甚至卖儿卖女也无法还清。

地主的剥削手段,还有其他种种。如地主家喜庆婚丧,逢年过节,佃户们都要送礼、“帮忙”等等。广大劳苦大众饥寒交迫,加上官吏、军阀的苛捐杂税,被逼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陷入苦难深渊。

第二节 近代九江县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九江县人民早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百余年前,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并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掠夺、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民争自由求解放的斗争历史。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第一天起,九江县人民就同全中国人民一道,自发地起来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

1861年3月,英国领事巴夏礼与清政府张集馨共同划定九江租界范围后,英国领事许士于当月28日又一次对租界地进行丈量,企图扩大租界面积,引起当地群众的愤怒。大家集合起来向许士等侵略者投掷石块,并打碎英领事馆大门,向英国人示威。清政府秉承英国侵略者的旨意,对示威群众进行镇压,但九江县人民并未被吓倒。1862年3月,九江县人民又因租界外居民开挖界沟而遭英军击伤,再次爆发了抗英斗争怒潮。这次斗争又因封建统治者软弱无能,以允许英租界扩大五丈,医治受伤群众而了结此案。

1863年3月27日,英国领事佛礼赐再一次私移界桩,企图扩大强占租界地,并开枪射击上前阻止的当地居民赵成武,此种强盗行径令九江县人民怒不可遏,他们砸开大门冲进领事馆,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4月19日,英国驻

京公使卜鲁斯照会清政府,威胁说:“倘若此后再有所妄为,诚恐难免用武保安。”并要清政府追究江西文武官吏的责任。4月20日,清政府主持总理事务衙门的奕欣接到英公使的照会,吓得要命,次日即复英使照会,向侵略者保证对抗英的群众从严惩办,绝不宽恕。九江县人民这次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因此遭到英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

1867年,美国侵略者侵入九江,他们抢占肖家街修建基督教甘南堂,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肖家街位于当时的县城东隅,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历来为肖氏家族聚居之地。美国侵略者看中了这块可以建教堂、建学校的风水宝地,勾结清政府,以“跑马圈地”的强盗行径霸占肖家街,并限定肖氏居民三天以内全部搬迁完毕。肖氏居民向清地方政府请愿,清政府与美国强盗串通一气,将三名请愿代表杀害。肖氏居民在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支持下,誓死不肯离开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他们手持棍棒与全副武装的美国侵略者马队进行了英勇的搏斗,最后被残酷镇压下去。

1906年3月7日,湖口农民余发成初到九江,路过英租界,随意观望。英总巡捕马士发现后,即用警棍打击余的头部和全身,余当场倒地,抬到医院,不治而亡。8日,德化县(九江县)知县到医院验尸,验明死者身上有致死伤3处,确定为被击伤致死,遂报经九江道台文福照会英国领事倭纳,坚持要求惩办凶手。英领事复照称:该巡捕仅用木棍将余推开,并未用力殴打。只因余身体软弱,行至数步,自行倒地,抬到医院诊治,其人体弱,血停身亡,并无伤痕。

英领事歪曲事实,推脱罪责,把凶手美化成善人。当即

九江各界群众奋起抗议,码头工人拒绝为英船装卸货物,对英实行抵制,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迫于九江人民的压力,英国驻沪高级审判官盛金生来浔,判定赔偿 500 大洋,但是言称按英国法律,打人者只能监禁数日,并无偿命之理,凶手马士当场以无罪开释。当时在场的清政府官员无人提出异议,棍打人命案就此了结。

1919 年初,九江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在租界强收路税的斗争。由于英方在九江租界强行征收路税的行为日渐加剧,并常常以皮鞭木棒殴打中国人,引起九江人民群众的激愤。社会各界公推代表赴清地方政府请愿,要求清政府向英国领事馆抗议和交涉。在广大人民群众의 坚决斗争下,英侵略者不得不取消了租界部分苛税。

1920 年 3 月 14 日,英租界巡捕在太石码头货栈无故将码头工人黄万和等人打伤,引起码头工人与巡捕发生冲突。英领事馆立即召来军舰上的水兵,企图镇压工人。九江码头 1000 余工人当天举行罢工,并在英租界示威。3 月 22 日,工人代表向英领事提出谈判条件,要求撤换英捕头,惩办凶手,保护华工,同时要求英国水兵不得随意登陆滋事。罢工持续 20 余天,英领事被迫答应将捕头免职,并赔偿被打工人的抚恤费。罢工获得了胜利。

以上这些斗争,虽然都是局部的、自发的,但是充分反映了九江县人民的反帝爱国精神。通过这些斗争,也使人们认识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只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才是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最根本问题。

二、九江县人民响应辛亥革命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的湖北武昌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它一举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虽然这次革命的果实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所窃取,中国仍未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但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更加高涨。

九江县人民积极响应并参与这场伟大革命。早在1902年,进步青年蔡公时、张华飞、徐秀钧三人,在九江县城组织起一个“慎所染斋”,明为讲学,实为传播革命思想,遭到了清政府九江当局的压制,“慎所染斋”被迫关闭。蔡公时等三人随即东渡日本留学,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1905年,三人同时加入同盟会,以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为革命目标。学成回国后,蔡公时在九江、南昌一带活动,张华飞被派往北京进行秘密活动,徐秀钧回到九江。他们分头秘密联络同志,传播革命思想,建立革命团体,并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商团。商团成立后,首先创办军事训练班,邀请清政府北洋陆军驻江西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的新军军官多人做教练。林森、吴铁城、俞仙根、何瑞昌等革命党人,亲自参加训练班的学习,接受军事教育,掌握军事技能,为起义作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

当时,清政府在九江布有重兵,沿江设有金鸡坡、岳师

门等炮台,在县城周围驻有陆军江西第二十三混成协第五十三标(相当于现在军队的团级单位)3个营和庄守忠所率第五十五标的第二营,以及常备军、巡警等武装力量3000余人,几乎为清政府江西兵力的一半。

武昌起义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九江率先响应。1911年10月13日,九江革命党人控制的金鸡坡炮台的头目陈迁训于夜间8时,依照原计划发炮3响,示意九江起义开始。早有准备的城内新军各营吹号集合,起义军臂缠印有“同心协力”四个字的白布,向清政府地方道署发起进攻。守卫道署的卫兵听到炮响,即在门头举火接应。五十三标全体官兵齐声哗变,荷枪实弹,分据路口,在城内各街戒严。当晚9点至12点,起义军相继攻占了道署两衙。24日上午8时,起义军进攻坐镇九江的清提督使辕,其卫队40人归顺新军。至此,清军在九江的江防、陆防、警界武装全部瓦解,九江县城乡全部光复。

九江军政分府成立后,即在江边招商码头竖起中华民国大旗,军学各界以及城中商店均悬挂欢迎中华民国的小红旗。革命党人将“浔军都督布告”贴遍城乡。布告曰:“大汉光复,万姓欢腾。义旗所指,首在安民。胡虏入关,各处屠城。我军宽大,不乱杀人。倘敢抵抗,有死无生。凡我同胞,戮力同心。解放束缚,再见光明。三呼万岁,革命功成。”九江起义不但消除了武昌革命政府的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既直接以战舰及步兵支援武昌打击清军,又在九江成功地粉碎了清朝海军企图围剿武昌的阴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第二舰队海军停在九江江面上的十二艘军舰,因缺米缺水缺煤,自汉口退至九江。九江的革命党人陈中

瑞、林森、吴铁城等登舰劝其合作,并负责筹发薪饷,慷慨陈词,诸舰将士均为感动,遂加入新军,全部在九江起义参加革命。11月19日九江军政府派遣战舰及步兵抵达武昌下游的青山前线,攻击三道桥的清军,击毙清兵600余名,致使清军大损。11月21日九江军步兵4个营和10门火炮又受命支援武昌,22日在青山一带攻击清军。27日九江援军约3000人抵达武昌参战,解除了武昌之危。九江可谓既是武昌的水上前哨,又是武昌之屏障,清朝海军又在九江起义,海军的威胁自然排除,致使清军围攻武昌的计划彻底失败。

九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九江率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接受革命军政府领导,公开竖旗,号称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声震海内外,为创建民主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12年10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来赣视察,途经九江,接见各界人士时,十分高兴地说:“武昌起义,九江响应最早,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对九江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九江商团不仅在九江光复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还组队出征南昌、武昌,为南昌的光复及解除清军对武昌军政府的围剿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九江商会还是辛亥革命期间九江起义的重要活动场所。诸如促使清海军归顺革命军政府、欢迎孙中山先生视察九江、九江军政府国饷筹措等重大活动,都是在九江商会举行的。武昌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为九江总商会书写“九府统宗”四个大字,以表彰九江商民、商团在光复事业中的功勋。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是,这一革命胜利果实不久就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使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遭到夭折。自19世纪50年代起到20世纪初的前10年,九江县人民此起彼伏的革命斗争,终因阶级的局限,先后均以失败告终。这充分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的。